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問題與討論

Questions and Discussion

doi:10.6752/JCS.201503_(20).0011

文化研究, (20), 2015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0), 2015

作者/Author：高橋哲哉;蔡岳璋

頁數/Page：216-22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5/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503_\(20\).0011](http://dx.doi.org/10.6752/JCS.201503_(20).001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問題與討論

Questions and Discussion

高橋哲哉等

蔡岳璋整理

陳光興（交通大學社文所教授）：

爲什麼高橋先生選擇以「犧牲」作爲整個論述的核心關鍵字？犧牲體系是否超越國外？反核、反基地與保護日本憲法三者運動間的關係爲何？

高橋：

首先，我選擇以「犧牲」爲關鍵字，是與2007年跟大家一同討論靖國神社的問題有關的。這樣的發想主要起自於對1945年以前以天皇爲中心而爲國家犧牲的思考。在「靖國問題」的構造中，國家要求國民爲國而死，這件事被日本帝國美化。戰敗後日本建立新憲法，在新憲法下，國家不再（像戰前那樣被公開要求）具有犧牲體系。然而，在國安保障與經濟發展中，實則隱藏犧牲體系於其中，例如沖繩與福島的民衆就被暴露在犧牲之中。在沖繩與福島實際有被犧牲（但又無法公然要求）的情況下，政府以各種的補助方式讓情況看起來不像是犧牲的體系。福島縣知事曾公開提到，對於自己的縣民感到十分驕傲，因爲日本電力的供應是出自於我們福島，沖繩的情況亦然（即宣稱日本國土保安出自沖繩基地）。戰前國家要求國民犧牲的情況，在戰後仍然持續著。至於犧牲體系超越國外，我曾與韓國學者討論過核電議題並出版書籍。關於第三個問題，我覺得反核、反基地與護憲三者的確有相重疊之處。一個實例是，311之後東京的反核運動興盛，但參與運動者對另外兩者（反基地與護憲）的運動理念究竟認識到什麼

地步，則是很有疑問。東京的反核遊行最高潮可以有十萬人，但若在東京號召大家為沖繩的反基地運動遊行，要能有一千人就很不容易了。在這裡頭，右派與反核能運動合作實屬不易。右派有贊成核能發電者，也有反核能發電者（主張保衛美麗國土），後者與左派反核者能否合作也是一個問題。至於護憲運動與反基地運動，在1960年代兩者的連結，關係密切，但現在也拉出了相當距離，護憲者不見得反基地。我自己的立場則是：反核、反基地但是護憲。

Alain Brossat（交通大學社文所客座教授）：

既然在二戰（1945年）前後，犧牲體系存在著連續性，那麼為何日本人民可以接受這種犧牲思維的治理？是否有其內在文化傳統或政治因素？另外，日本作為在生命治理上傑出的現代國家（如：醫療體系完善、國民長壽人口比例），為何政府的治理會朝向一個讓人民死亡的犧牲體制前進？其中存在著嚴重的矛盾問題，這是日本的特殊現象，或者是在這個特殊現象的形式下有個普遍性的問題在其中？

高橋：

1945年以前（即日本軍國時代）的犧牲體系，國家公然的正當化這樣的犧牲，存在於天皇制與人民之間的關係。至於戰後，雖然犧牲體系不再被（公然）允許了，但卻以不公然的方式（如金錢補助犧牲的地區）延續了這樣的犧牲構造，讓結構看起來好像沒有人被犧牲。戰後情況雖不像戰前那樣（指天皇——全國國民的扈從結構），但戰後的國民理念，也區分成很多的區塊。比如，在美軍的沖繩基地例子中看得最清楚（日本本島——沖繩的扈從結構），日本國民將基地放在沖繩，這樣的構造仍然是以殖民主義的方式對待沖繩，日本國民與政府便構成了共犯關係。又如，在核能發電的問題上，作為能源主要消耗地的首都東京沒有建立核電廠，反而在距離東京很遠、能源消耗少的邊遠地區建立了核電廠，在這樣的關係中也可以看到同樣的結構——在連續的生命

airiti

整體之中切割、區分生命政治的他者。在沖繩問題中，由「大和的日本人」與「沖繩人」，在核電問題上則是「東京首都圈」與「福島」。在這樣的關係中，一邊（大和、東京）是接受利益的多數者，另一邊則是少數的、被犧牲的、生命政治中的他者。

藍弘岳（交通大學社文所教授）：

在日本，爲了正當化核能問題與基地問題的過程，其中也利用反中情緒。從這個角度來講，釣魚台的國際承認關係與日本內部的緊張——犧牲體系的成立，存在著某種連結，不曉得高橋老師怎麼看？其次，福島輻射對東京的影響衆說紛紛，不曉得高橋老師是否有來自內部的情報提供？

高橋：

這要從冷戰結構講起，的確是美日安保合約引發基地問題。過去7、80年代的時候，日本對中國的情感是好的，90年代之後開始變不好。這兩者是否有密切關係，事實上也不完全這麼講，但現在情況下，日本的確要利用反中情緒強化基地建設問題的正當性，這樣的現象的確存在。至於第二個問題，情報很多，但我不會建議學生怎麼做，而是留待吸收多方情報的學生，大家自行判斷，這是我的態度。我在東京生活，也有親戚在福島，整個關東地區被想像成是灰色地帶，其實很難告訴大家怎麼行動。然而，被迫回到灰色地帶生活也是犧牲體系的一環。

高橋：（對崔愨欣、陳瑞樺的回應）

關於美軍基地與核能這兩個問題，完全不能忽視美國存在。核能事件爆發的時候他們一度想放棄，但菅首相說，如果放棄的話，我們就會被美國佔領。從結構上講，美軍的位置在日本是超越安保、超越日本法律之上的。美軍可以自由進出日本，不用經過入國審查，從這裡可以看出美軍超越（日本）法律之上，台灣問題也必須從這個角度來看，亦即美國在東亞的地位。雖然日本附屬於美國之下，但日本也從中獲益，並且正因為獲得的利益非常強烈，所以難以反對這樣的情況。

關於崔老師提到核能公投的問題，我在書中也有提到，彼此想法蠻接近的。事實上，現在日本反核的人很多，如果公投的話，通過機率也會蠻高的，但我反對讓大部分人來決定少部分人的利益。針對陳老師的回應我也完全贊同，後續還有問題請再繼續提問。另外，311之後核能曾一度關閉但日本經濟並不因此垮掉，也有人擔心沒有核能的話，夏天很熱怎麼辦？但事實上我們已經這樣過了三個夏天，還是可以度過去。至於要用什麼能源取代核能呢？日本不像德國有明確方案，但日本也朝著再生能源或自然能源的運用這一方面去思考。

編按

高橋哲哉教授的演講後，引起與會者熱烈的討論，但因為高橋教授行程緊迫，討論時間有限，一些問題則在會後繼續討論，朱元鴻教授在會後記述並說明了這段討論，也感謝崔愷欣秘書長再次提出說明，本刊將這段「會後談」與「後記」作為補充一併提出，希望能夠呈現不同角度面對「核能」問題的理解與思索。

會後談

朱元鴻（交通大學社文所教授）說明

作為高橋哲哉教授這場演講的主持人，我原本準備了兩個問題，但因為高橋先生下午必須趕赴台北的活動，我必須讓演講討論準時結束，因而未能在會場提出。不過自助午餐與合影拍照前後，我有機會將原先想提的問題分別跟Alain Brossat教授以及崔愷欣秘書長做了一些簡短的交談，簡述如下。

朱元鴻（對談Alain Brossat）：

今天的主題，核能作為犧牲體系的一個例證，在您來自的法國可有類比的說法或認知嗎？我特別對法國的對照感到好奇因為法國是核能大國，75%的電力來自核能，由於電成本低廉每年有卅億

歐元的電力出口獲利，包括反應爐在內的核能科技也成為法國出口強項，還有17%的電力來自核廢回收處理。年輕時看雅蘭德倫的電影知道60、70年代法國社會對於政府秘密搞核武試爆有批判反對的聲音，但是反對核能的聲音在法國似乎不很強大，雖然在福島事故之後也有些抗議活動。由歷史來看，從右翼的Gaullist政黨到左翼的社會黨與共產黨都支持核能。似乎法國沒有在怕核能，而且核能不僅是被接受，甚至可以說受到歡迎。

Alain Brossat :

確實，跟日本那種犧牲思維的文化傳統很不同。核能，在法國一般公眾認知是編織在另一套文化驕傲的價值裡：國家能源獨立，領導減低溫室氣體的環保前鋒，尤其是核能跟TGV高鐵與協和號超音速客機一樣，表現法國科技前瞻的文化驕傲。

朱元鴻（對談崔愷欣）：

今天您的發言很適切地以台灣狀況例說了核能的多重犧牲邏輯。不過您議論回應的對象多是台電官員的層次，我略感意猶未盡。在福島事故之後，世界對核電廠興起了一波恐懼的關切，然而自21世紀初迄今也有一波強勁的核能復興潮流，特別值得注意的除了支持核能的科學家如*The Nuclear Energy Option*作者Bernard Cohen，還有早先反核的科學家如James Lovelock，以及「支持核能的環境主義者」(Environmentalists for Nuclear Energy)積極行動的作家如Steward Brand，George Monbiot等。對於您提出的一些核能負面的問題，他們有深入細緻的評估供人們再思考：對於車諾比與福島事故後販賣恐懼的謊言以及無知的媒體恐慌也有所揭發。最核心的問題仍然在於溫室氣體的排放。考慮了所有風力／太陽能／再生能源之後，真正能夠替換煤／石油／天然氣火力發電而且足以當作電力基礎負荷(base load)的仍是核電。而煤／石油／天然氣開採在工安、土地、水源上的犧牲，火力發電排放的懸浮微粒（PM2.5）成為不認國界的健康殺手，二氧化碳造成摧毀森林的酸雨，導致大規模旱澇及海平面上升等氣候劇變的溫室

效應，這些犧牲體系或無責任體系，您這篇發言時間有限未能納入考慮我能夠理解，但「支持核能的環境主義者」所要求考察的犧牲體系或無責任體系顯然範圍更廣。

崔愨欣：

那些曾經反核而後來立場轉變的科學家是被收買的。

後記

朱元鴻：

這是走廊上的對話，我不會嫌唐突。科學家或作家與核能遊說組織的關係值得明察。早年反核，也是綠色和平創始者的Patrick Moore，後來認知與信念轉變為支持核能，還擔任核能遊說機構(Nuclear Energy Institute, NEI)的主席，他敘述自己環境主義理念轉變的傳記，讀者敬之惡之涇渭分明，是個有爭議的例子。但Bernard Cohen以及James Lovelock這些獨立的科學家我不會輕率地這麼影射。別忘了不只核能有遊說組織，石油業例如BP，Chevron，Exxon-Mobil，Royal Dutch Schell，Total SA否認全球暖化氣候劇變的遊說能力遠比NEI更強大。許多跟生態相關的知名NGO都受到大石油公司的贊助，包括訓練NGO領導人才的Aspen Institute for Humanistic Studies、大自然保護協會(Nature Conservancy)、綠色和平(Greenpeace)、山嶽協會(Sierra Club)以及其他一些反對核能的組織。換言之，石油業利益遊說迄今仍是壓制包括核能在內所有替代能源的霸權，「被收買」絕非反核陣營得以專享指向對手的指控。

崔愨欣：

我想朱教授對於我提收買一辭也許感受不佳，但必須給我時間來完整論述環保界對這此事的看法，核能界最愛提的一個負面例子就是曾在綠色和平組織任職的Patrick Moore，綠色和平已經一再公開聲明其不代表綠色和平更非創辦人之一，目前Patrick Moore

是一個受雇於核能業、伐木業、基因改造業的發言人，長達二十年之久，他時常利用多年前與綠色和平的關係取信於傳媒。許多媒體仍認為Moore先生代表綠色和平，並對他是一個收費的遊說員一事隻字不提。

當各界批評核能是逐漸下滑的夕陽產業時，正值氣候暖化的環境意識興起，的確有部份科學家開始思考是否要以核能取代火力電廠，核能界抓緊機會將核電包裝成解決地球暖化的先鋒，並大力宣傳，但是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早於1999年已認定，核能業的最大遊說團體美國核能研究院(Nuclear Energy Institute)聲稱核能對環境帶來的益處是誤導的，因為它試圖收起不談核燃料棒的製造過程本身就會產生溫室氣體的事實。聯邦貿易委員會的結論是，美國核能研究院的論述理由並不充分，「因為現時還沒有任何永久的核廢料處理和棄置系統，和因為供核子反應爐使用的鈾元素，其濃縮過程中會釋放溫室氣體……」新加坡大學的Sovacool教授(2008)彙整了國際上103項關於核能生命週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研究，依據研究時間、方法及資料透明度篩選出19項可信度較高的研究，統計分析後顯示核電的整體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量平均值為每度66克二氧化碳當量，核燃料提煉端佔了38%。若保守以平均值與其他再生能源相比較，顯著屬於高碳能源，此外，史丹佛大學Jacobsen教授(2009)也指出，除考量整個生命週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外，若將興建核能的機會成本以及恐怖份子所造成的安全風險納入考量，則其碳排放量攤分後，核電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將高達每度180克二氧化碳當量，排放量為其他再生能源3倍以上，以上研究顯見科學界對於此事仍有極大爭議與討論。

但核能從來就不只僅僅只有科學討論，由於牽涉龐大的經濟與政治利益，一切都變得無比複雜，在2006年4月，核能業的最大遊說團體美國核能研究院發起了「清潔安全能源聯盟」(Clean And Safe Energy Coalition)，並雇用了布希政府的前美國環保署署長Christine Todd Whitman與Patrick Moore作為共同主席。該聯盟為

公關巨擘偉達公司(Hill & Knowlton)所籌畫的公關計畫之一，據了解，其與核能業的合約高達八百萬美元。

究竟核能是不是解決氣候變遷的必要之惡？整體來說，沒有簡單的答案，但若是直指核能就是最優先的選擇，顯然非常偏頗不公。國際能源總署2013年研究報告指出，要讓全球避免氣候變遷的不可逆災難，節能比起其他措施能提供更重要的減碳成果。環保界對於減碳從未曾忽視，但反觀政府的舉措卻遲滯不前，2009年全國能源會議雖訂有能源效率提升目標，但這幾年來卻從未認真當一回事，更遑論據此執行節能目標。因此，若要認真談減碳，首先必須向政府施壓，從政策下手，並將其法制化嚴加考核，而非僅草率的將減碳當作推動核電的藉口。